

破解管理瓶颈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

——推动“城市奔跑者”从“城市过客”到“治理伙伴”

市委党校第十五期中青年干部培训二班 第七调研组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加强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等重要部署，为未来五年新就业群体发展与治理工作指明了方向。在此背景下，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快递揽派员等新就业群体已成为城市运转的“生力军”和居民生活的“服务者”，其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价值日益凸显。截至目前，茂名市新就业群体常态化就业者约2.62万人，其中外卖配送员0.47万人、网约车司机1.55万人、快递揽派员0.6万人，三类群体日常核心活跃人数约1.5万人。他们每天游走于城市大街小巷，日均行程约50-70公里，走街串巷、覆盖面广的职业特性，使其既是城市治理的服务对象，更是弥补基层治理信息盲区、响应速度慢等短板的重要潜在力量。推动这些“城市奔跑者”从“城市过客”转变为“治理伙伴”，既是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也是破解该群体职业认同感弱、社会归属感低及高流动性带来的治理不确定性问题的关键路径。

当前，茂名新就业群体在参与基层治理中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与此同时，实践中存在的协同机制不健全、保障措施不到位等问题也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予以妥善解决，以便进一步推动这一群体充分发挥在基层治理中的独特作用，为助力和谐社区建设、提升城市治理精细化水平注入更强劲动力。

一、现状与基础：服务管理与治理融入的初步成效

(一)政策与组织体系双夯实。我市已出台《茂名市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明确劳动报酬、社会保险等核心权益保障方向；同时建成各类新就业群体服务站270余个，为该群体提供线下活动与服务的载体。党建引领持续强化，茂南区率先成立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支部，推行双重教育管理，有效提升组织凝聚力，为治理融入筑牢组织基础。

(二)治理参与效能初显。部分区域已探索规模化参与路径，如茂南区招募94名新就业群体“党建网格员”，依托其“移动探头”优势，累计上报并协助解决市政设施损坏、安全隐患等各类问题210余个，在城市精细化治理中发挥了重要补充作用。

(三)先进典型引领风尚。2025年7月，茂名高州的50岁外卖骑手吕伟权在送餐途中，从十余米高的鉴江桥跃下，成功救起一名落水女

子。其跳桥救人的英勇事迹入选中央政法委2025年见义勇为勇士榜，不仅展现了新就业群体的责任与担当，更印证了该群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巨大潜力，为其他从业者树立了可借鉴的榜样。

(四)组织覆盖逐步拓展。市总工会通过活化建会模式扩大新就业群体会员覆盖面，全市已成立新就业形态工会组织166个，搭建政府与群体间的沟通桥梁，在权益协商、诉求处理等方面发挥初步作用，为治理参与中的权益保障提供了初步支撑。

二、瓶颈与制约：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突出问题

(一)政府服务保障与引导机制不完善

现有政策多聚焦劳动权益保障，缺乏针对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专门规定，未明确其职责边界、工作流程、权利义务和保障措施，导致参与过程中“无所适从”。激励机制以临时性表彰为主，缺乏社保优惠、子女入学等长期性政策激励，社会认同度和个人满足感不足。虽已建成270余个服务站，但存在装修装饰过于严肃正式、吸烟等个性化需求难满足、开放时间与休息需求时段冲突、选址与群体作业区域匹配度低、重搭建轻运营等问题，实用效能未充分发挥。政府与企业、群体间的常态化沟通机制尚未健全，治理需求与服务供给存在错位。

(二)企业平台协同治理责任缺位

平台算法的刚性约束使得新就业群体难以自主安排时间，参与治理可能导致接单减少、收入下降，形成“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的两难选择。多数企业将基层治理视为政府责任，缺乏主动参与意识，除顺丰等少数快递企业外，其他平台企业均未建立协调员工参与治理的专门机制。平台考核机制单一，以差评、满意度为核心的考核体系未纳入治理参与激励，且未建立相应的时间补偿和经费补贴制度，进一步抑制了群体参与积极性。

(三)社会公众认知存在偏差

社会公众仍将新就业群体视为“管理对象”而非“治理伙伴”，传统管理思维忽视其主体地位。对该群体的宣传多聚焦吕伟权等先进事迹，缺乏对其“党建网格员”“移动探头”等治理角色的系统解读，且宣传渠道局限于行业内部，导致市民认知模糊。部分群体存在违章停车、超速等不规范行为，进一步引发公众负面评价，物业无理由禁止外卖骑手进入小区等“接单障碍”，既影响其职业认同感，也制约了参与

治理的积极性。

(四)群体自身参与能力与意愿双不足

新就业群体普遍缺乏“城市主人翁”意识，多将自身定位为“临时工”，边缘化认知导致参与动力薄弱。该群体以年轻人、大专以上学历为主，未接受系统治理培训，缺乏应急处置、矛盾化解等专业技能；且日均工作时长平均约9-12小时，劳动强度大，叠加半年留任率仅33.7%的高频流动特性，难以抽出精力建立长期参与关系。同时，除了快递行业，其他新业态行业群体多是与平台签订劳务协议而非劳动合同，参与治理时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等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安全感严重不足。

三、对策与建议：构建新就业群体深度参与基层治理新格局

(一)优化政府服务，强化政策保障支撑

1.健全制度与指南体系。市委、市政府出台《茂名市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实施细则》，明确各方职责、参与流程方式、激励标准和保障措施。制定“正面清单+负面清单”，编制通俗易懂的《参与指南》，让治理参与有章可循。

2.完善多元激励机制。构建“物质激励+政策优惠+精神表彰”三位一体体系：物质上，积分可兑换公交卡、体检套餐等；政策上，建议对连续两年参与治理且表现优秀者(如优秀“党建网格员”)，给予社保缴费补贴、公租房及子女入学等申请倾斜；精神上，每年评选市级“好心先锋”，邀请参与政府工作会议，提升荣誉感。

3.开展碎片化精准培训。依托现有服务站，联合职业技术学校、行业协会，开设30分钟以内的“微课堂”，利用午休时间、订单淡季开展应急处置、矛盾调解、消防安全等实操培训；针对群体特点和接受习惯，推出图文手册和短视频教程，建立培训学分制，学分可兑换积分或优先参与激励项目，降低学习门槛。

4.升级现有服务阵地效能。对各类服务站点进行“亲民化”改造，优化装修标识，增设吸烟区以及舒适座椅、手机充电口等实用设施，重点商圈驿站参照无人便利店模式实行24小时开放。探索引入社会资本，以社会荣誉和信用激励吸引企业参与，并在项目合作、政策扶持上给予支持，破解运维难题。借鉴汕头金平区滨海社区“爱心骑手驿站”的政企协同经验，在配送需求集中的办公楼、小区与商超周边新增微型暖心驿站，由街道党工委牵头，社区党组织协调场地并对接物业资源，政府予以运营补贴，实现“就近可享、随时可用”。同时，开发服务驿站

专属小程序，整合站点位置信息，支持骑手一键查询就近驿站、导航前往，让暖心服务随时可达，提升群体获得感。

5.搭建数字化赋能平台。借鉴珠三角地区经验，整合现有服务资源，打造茂名市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数字化平台，实现“治理任务发布、积分兑换、技能培训、权益投诉”一键办理，适配群体工作碎片化特点，提升参与便捷度。

(二)压实企业责任，搭建协同治理平台

1.构建平台企业激励机制。对参与基层治理的平台企业可给予多方面激励，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一是名誉激励，设市级“社会责任典范企业(基层治理专项)”称号，按治理参与度、成效评选，通过政府官网、主流媒体宣传授牌，提升企业美誉度与荣誉感；二是政策激励，优秀企业可享受审批“绿色通道”、优化信用监管，设专项扶持资金按治理成本比例“以奖代补”，降低企业参与成本；三是市场激励，政府采购招标增设“基层治理贡献度”加分项，以服务时长、民生问题解决量等为标准，转化企业竞争力；四是品牌激励，政企联合打造“茂名先锋骑手”等IP，群体背书宣传、企业落地运营，能有效增强企业在本地的用户粘性和员工凝聚力。

2.优化平台算法与管理。倡导并鼓励平台企业践行社会责任，在算法设计中引入“社会治理贡献度”参数，为积极参与治理的劳动者提供一定的订单优先、时间宽限或积分奖励。探索设立“社会治理假”或“公益时段”，允许劳动者参与社区治理活动期间不纳入订单超时考核。

3.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与考核引导。将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纳入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对积极支持员工参与治理、落实权益保障的企业，在政府项目合作、评优评先中予以倾斜。督促企业设立专门部门或指定专人，对接街道社区与“党建网格员”队伍，统筹安排治理参与活动；推动平台改革单一考核模式，降低差评权重，增设“治理参与加分项”，对获得社区表彰的员工给予薪酬上浮、优先派单等奖励。

(三)引导社会认同，营造包容接纳氛围

1.转变公众认知与增进理解。通过主流媒体、社区宣传栏、业主微信群等渠道发布《致市民朋友的一封信》倡议书，倡导职业平等、尊重新就业群体职业选择；组织“骑手体验日”“司机开放日”活动，邀请市民、社区工作者跟随作业，直观感受其工作状态与治理价值，减少认知偏差。

2.扩大治理角色宣传覆盖面。制作系列短

视频、漫画，系统解读新就业群体“党建网格员”“移动探头”等治理角色及案例，在抖音、微信视频号等平台广泛传播；在本地主流媒体开设专题栏目，既报道先进事迹，也解读其治理优势，提升社会认同度。

3.规范行业秩序与破解接单障碍。由交通运输、交警、城管等部门联合平台开展“文明从业专项行动”，通过线上提醒、线下巡查规范作业行为，对违规行为实行“首次警告、二次培训、三次限流”梯度管理；由社区牵头协调物业、业委会，制定新就业群体进入小区的管理规范，明确进入路线和停留区域，禁止无理拒入，同时在小区设立“无接触配送柜”“外卖取餐点”，减少作业纠纷，提升职业认同感。

(四)强化主体赋能，激活参与内生动力

1.培育身份认同与职业尊严。通过平台APP、服务站、本地自媒体等渠道，传播“城市合伙人”“社区共建者”理念，除宣传吕伟权等典型外，政府部门联合企业定期评选“最美骑手”“文明司机”“优秀党建网格员”，在社区和各住宅小区设立“无接触配送柜”“外卖取餐点”，减少作业纠纷，提升职业认同感。

2.破解权益与流动双重顾虑。推动平台企业与新就业群体签订规范劳动合同，暂不具备条件的签订补充协议，明确参与治理期间的工伤赔偿、误工补偿等条款。建立权益保障“绿色通道”，设立专线电话，快速处理欠薪、工伤等纠纷；同步建立“一人一档”动态管理机制，整合平台数据与社区登记信息，记录就业轨迹和治理参与情况，推行跨社区积分通用制，积分在全市范围内兑换生活用品、公共服务优惠券，破解聘任率低导致的参与断层问题。

3.创新弹性参与模式。借鉴茂南区“党建网格员”经验，推广“配送员+信息员”“网约车司机+宣传员”等专属角色，在现有“微心愿”治理平台的基础上，完善、扩充功能以提升使用便利性，允许通过“随手拍”上报隐患、线上建言献策、参与特定时段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治理，实现“随时随地、量力而行”。

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是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通过政府保障、企业协同、社会认同、主体赋能四维发力，既能解决该群体急难愁盼问题，又能激活基层治理新动能，推动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和谐社区建设新格局，为推动我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让非遗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焕发时代新生

李万甘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推进文化传承发展与乡村振兴作出战略部署，明确提出“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并强调要“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这为非遗系统性保护、创新性转化指明了方向，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内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跳花棚”作为粤西农耕文明的活态遗存，近年来在政策支持与社会协同下，逐步探索出一条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成为乡土文化振兴的生动缩影。

深耕农耕文明根脉，彰显非遗时代价值

非遗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农耕文明中积淀形成的活态文化遗产，承载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维系着乡土社会的伦理秩序与情感认同。它并非静止的历史标本，而是融入节庆礼仪、手工技艺、民俗展演等实践中的文化基因，是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

“跳花棚”起源于明清初粤西地区的农耕祭祀，清代《化州县志》载：“岁终雉戏，谓之‘跳花棚’，戴面具，执农器，歌且舞，以祈丰年。”其表演以固定程式演绎耕作、狩猎、祭祀等场景，凝结着岭南先民对丰收的期盼与对天地的敬畏。2011年，“跳花棚”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成为彰显地域文明特质的重要标识。

从历史维度看，“跳花棚”是研究岭南农业社会与民间信仰的活态文本；从艺术维度看，它融合傩仪、武术与民歌，面具、服饰与动作体系具有独特美学价值；从社会维度看，它曾是凝聚乡村共同体、传递勤劳敬畏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今天，传承非遗不仅是对文化根脉的守护，更是为当代人提供反思现代性、重建精神家园的文化镜鉴。推动非遗融入乡村振兴，正是要激活这份深植于土地的文化自信，使其成为涵养乡风、润泽心灵的重要力量。

激活非遗文化基因，赋能乡村振兴

非遗所具有的实践性、传承性与流变性特征，使其成为激活、整合与提升乡村文化资源的战略支点。推动非遗保护传承，必须超越静态保存的思维，着力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与当代乡村生活、现代文明需求的有机衔接。

关键在于推动非遗“活态融入”。要引导非遗走进乡村公共生活、生产实践与教育体系，使其在当下生活中焕发新的生命力。例如，化州市将“跳花棚”改编为健身操，组织群众集体习练，既丰富了基层文化体育生活，又在潜移默化中传承了文化记忆。与此同时，“跳花棚”多次亮相广东非遗周、佛山秋色巡游等省级平台，从2016年首演至2025年的持续创新，展现了其跨越时间的艺术魅力。

这一活化过程，有效串联起乡村的历史遗存、生态景观、特色物产等资源，形成“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融合发展格局。在簕寮镇黄瓜文化节、新安镇水果节等活动中，“跳花棚”的展演不仅塑造了“一

村一品”的文化标识，也增强了村民的文化自豪感与归属感。通过非遗基因的激活，乡村从文化资源的持有者转变为文化发展的主体，逐步构建起内源性、可持续的振兴路径。

推动非遗资源转化，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非遗是乡村蕴含的宝贵资源，能够通过系统控掘与创新利用，转化为产业升级、凝聚社区认同、塑造乡村品牌的内生动力，为乡村振兴提供持久支撑。

一是促进非遗与产业融合，培育乡村经济新动能。支持将非遗元素融入农产品开发、乡村旅游、文创产业等领域，提升产品文化附加值。例如，“跳花棚”通过舞台化、节庆化展示，带动了相关演艺、培训、道具制作等业态，拓宽了村民就业增收渠道，推动农民从生产参与者向文化传承者、价值创造者转变。

二是强化非遗在社会治理中的纽带作用。依托非遗传承活动，重建乡村公共空间，增强社区凝聚力。集体性的非遗展演、传习与实践，能够促进村民互动协作，重塑共同体精神，为乡村善治奠定社会文化基础。

三是塑造独具特色的乡村文化标识。在避免“千村一面”的乡村振兴实践中，根植本土的非遗资源成为彰显乡村独特性的核心要素。这种文化个性增强了乡村的吸引力和辨识度，有助于汇聚人才、资本与关注，形成文化引领、产业跟进、人才回归的良性循环。

坚持党建引领与机制创新，筑牢非遗传承保障体系

推动非遗助力乡村振兴，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完善政策与机制设计。要健全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协调机制，将其纳入乡村振兴总体布局，强化资金、人才与设施保障。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鼓励党员带头参与非遗传承与乡村文化建设。同时，注重吸引青年人参与非遗创新，培育本土传承队伍，加强与高校、研究机构合作，提升非遗传承的专业性与时代性。

积极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非遗活化利用模式。在保持非遗本真性的前提下，探索非遗与创意设计、数字技术、品牌营销的结合，拓展传播渠道，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通过示范项目、典型案例的培育与推广，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非遗赋能乡村振兴实践经验。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必然伴随着乡村文化的繁荣与振兴。非遗的活态传承与创新转化，正是唤醒乡村文化资源、培育内生动力、激活内生动力、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在新征程上，我们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政治担当，推动非遗深深融入乡村振兴战略，让古老技艺在当代田野上翩翩起舞，为广袤乡村注入绵延不绝的文化力量，打造一批“有灵魂、有特色、有活力”的乡村振兴样板，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贡献深厚的文化智慧。

(作者单位：化州市委党校)

浅析杜甫一生的忧愤情怀

杨绍精

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灵魂以血泪为墨，照亮沉郁的时代。杜甫，便是这样一位用诗笔写国家忧愤的伟大诗人。他的忧愤情怀，是大唐由盛转衰的史诗，亦是穿透千年的人性呐喊，既刻划着时代的苦难沧桑，也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与悲怆。

一、盛世微光里忧患萌芽

杜甫出生于“奉儒守官”的家庭，自幼受儒家思想熏陶，心中早种下忧国忧民的种子。他在年少时便展露了非凡的才华，“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稚气的诗句里，已然藏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以及对国家命运懵懂的关注。这份关注并非空穴来风，盛唐的繁华之下，土地兼并、边疆战事的暗流已在涌动，少年杜甫虽未亲历疾苦，却已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中，生发出对家国的天然责任感。

青年时期的杜甫，怀揣“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踏上漫游四方的征程。他游历齐赵，饱览山河壮丽，登顶泰山时写下《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首意气飞扬、满溢少年豪情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一句，不仅是泰山巍峨的赞礼，更暗含着诗人渴望登顶政治高峰、实现济世理想的雄心。彼时的杜甫目之所及，尽是大唐的繁华昌盛，心之所感却又有繁华背后的隐忧。在漫游途中，他眼见社会的贫富差距——洛阳城内米肉飘香，与郊外农家糠菜充饥形成对比；他听闻边疆战士戍守之苦，与长安权贵夜夜笙歌判若云泥。这些见闻如种子入土，在他心中生根发芽，便成为日后忧愤情怀的源头。此时的杜甫，尚未经历磨难，诗中的情怀还是以“壮志”为主，忧思只是潜藏的底色，却已为他一生的创作定下了“家国为先”的基调。

二、长安十年的清醒与呐喊

杜甫来到长安，怀着满腔热情与抱负，渴望得到皇帝赏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然而现实却给了他沉重一击，长安十年，他四处拜访，投赠权贵，却始终未谋得一官半职。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直白地写下自己的处境：“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这十年间，他从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沦为寄人篱下的寒士，尝尽人间的冷暖，看透世态炎凉。

在漫长的等待中，他对社会的黑暗与腐败有了更深的认知，目睹权贵的骄奢淫逸，看清他们为了一己私利漠视百姓死活的嘴脸。心中的无奈与愤懑，渐渐沉淀为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他不再执着于个人仕途的得失，而是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天地，以诗为刀，揭露社会疮痍。《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便是这一时期的巅峰之作，诗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句，如同一把利剑，直刺社会的痛点，将贫富悬殊的残酷现

实割露在世人面前。这句诗的震撼力，源于杜甫亲身的体验——他在赴奉先县探望妻儿途中，目睹路边因冻饿而死的百姓，而不远处权贵府邸，正传来宴饮的丝竹之声。这强烈的对比，让他的忧愤不再是文人的空泛牢骚，而是扎根于现实土壤的血泪控诉。在另一首诗中，他还写下“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以自身的“酸辛”反衬普通百姓的“骚屑”，体现出他对底层人民的共情与悲悯。长安十年，是杜甫人生的低谷，却又是他诗歌创作的重要转折，他的忧愤情怀从“潜藏”走向“显豁”，从个人理想的失落升华为对民生疾苦的关切。

三、离乱岁月的诗史长卷

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彻底改写了大唐的命运，也将杜甫的忧愤情怀推向顶峰。叛军攻破洛阳，占领长安，唐玄宗仓皇西逃，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杜甫在战乱中与家人失散，一度被叛军俘获，押至长安。他身陷敌营，目睹京城的残破与百姓的苦难，写下《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山河依旧，却是满目疮痍，花开鸟鸣本是赏心悦事，在诗人眼中却成了“溅泪”“惊心”的诱因。“国破”与“家亡”的双重痛苦，让他的忧愤充满了切肤之痛。“烽火连三月”写尽战争的漫长与残酷，“家书抵万金”道尽乱世中亲情的珍贵，短短四十个字，将时代的苦难与个人的悲怆融为一体，读来令人扼腕。

后来，他冒险逃出长安，追随唐肃宗抵达凤翔，被任命为左拾遗。可刚正不阿的性格，让他在官场屡屡碰壁，更因上疏营救房琯触怒肃宗，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赴任途中，他路过战争留下的满目疮痍，看到百姓在苦难中挣扎的惨状，挥笔写下流传千古的“三吏”与“三别”。这六首诗，是杜甫“诗史”特质的集中体现，他以客观的笔触，记录下战乱中底层百姓的悲惨遭遇。《新安吏》里，“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官吏强征未成年的“中男”入伍，百姓的悲痛与无奈跃然纸上。《石壕吏》中，“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墙走，老妇出门迎”，官吏深夜捉人，老妇被迫应征，“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的对比，将封建统治的残暴刻画得入木三分。《新婚别》里，新婚燕尔便要分离的夫妻，“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的诀别，道尽战争对人性的摧残；《无家别》中的士兵，返乡后却发现“故里但蒿藜”，无家可归的他只能再次从军。

“三吏”“三别”没有激昂的呐喊，却以最朴素的语言，道尽最沉重的苦难。杜甫的忧愤，在这些诗篇中不再是个人的情绪宣泄，而是化为对时代的忠实记录。他以“诗史”的笔触，为后人留下了一幅安史之乱的全景图，让我们得以触摸到那个年代百姓的血泪与挣扎。

四、迟暮之年的苍生情怀

乾元二年，杜甫因对官场失望，辞去华州司功参军一职，开启了漂泊西南的生涯。他辗转于秦州、同谷、成都等地，生活困苦不堪，甚至一度“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苍谷”，却始终未忘国家安危与百姓疾苦。

在成都，他得到友人的帮助，营建了草堂，度过了一段难得的安稳岁月。可内心的忧虑从未消散，日夜牵挂着北方的战事与流离的百姓。一场秋风卷走草堂的茅草，雨夜难眠的他写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自身正陷于“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的窘境，他的目光却越过一己之苦，望向天下寒士的颠沛流离。这份“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胸怀，早已从个人愤懑升华为心系苍生的大爱情怀。此时的杜甫，年过半百，饱经沧桑，他的忧愤不再有年轻时的激昂，却多了一份深沉的悲悯与坚定的担当。

成都的安稳并未持续多久，随着蜀中战乱再起，他不得不再次踏上漂泊之路，沿长江东下，途经夔州、岳州等地。在夔州，他登高望远，写下《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这首诗被誉为“七律之冠”，通篇皆悲，却悲而不颓。此时的杜甫，已是垂暮之矣，却依然将个人的“苦恨”与家国的“艰难”紧密相连，他的忧愤情怀，在岁月的沉淀中愈发厚重。

大历五年，杜甫病死于湘江的一叶扁舟之上，临终前，他仍在《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中写下“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的诗句，牵挂着未熄的战火与受苦的百姓。他的这一生，是漂泊苦难的一生，也是用诗歌践行“忧国忧民”理想的一生。

五、不朽的诗圣与永恒的精神

杜甫的忧愤情怀，贯穿他的一生，也贯穿他诗歌创作的始终。他的忧愤，从不是消沉的哀叹，而是对家国百姓的深切同情，是对正义真理的执着追求。他敢于揭露社会黑暗，敢于批判权贵腐败，更敢于为黎民百姓呐喊。这份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让他的诗歌超越了文学的范畴，成为镌刻时代记忆的史诗。与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浪漫自信不同，杜甫的诗始终扎根于现实的土壤，他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态度，将个人的悲欢与时代的脉搏紧密相连，最终形成了“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

再次捧起杜甫的诗篇，仿佛能看见那个烽火连天的时代，也看见那个步履蹒跚的诗人，在颠沛流离中，用瘦骨嶙峋的肩膀，扛起万家灯火的期盼。他的忧愤与悲悯，穿越千年的时光长河，依然叩击着我们的心扉，让我们懂得诗歌的力量，更懂得一个文人的使命与担当。真正的文字，永远扎根于人民之中，闪耀着不朽的光芒。